

从朝贡体系到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国地区秩序的百年重构

王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摘要:中国的秩序观与秩序实践先后经历了朝贡体系、殖民体系、条约体系的转变。当代中国的秩序观与秩序实践深受历史影响,实现了百年重构。中国推动秩序构建的实力基础经历了U型变化,从强盛到衰落再到强盛,但是中国秩序观与秩序实践并没有简单地重复,而是实现了扬弃。继承的方面包括:地缘战略重心在中国周边地区、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不干涉他国内政、统筹实力与体制的关系。变化的方面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地理范围上从亚洲走向了世界,在心态上从俯瞰天下到平等看待世界,从封闭自大到包容开放。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在继续发展实力的同时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继续保持平等、谦虚、开放、包容的姿态。

关键词:中国秩序观;地区秩序;百年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平等相待

中图分类号: D8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23)01-0026-11

DOI: 10.16740/j.cnki.cn43-1240/c.2023.01.011

一、地区秩序构建的“时代之问”

不管是否有主观意愿,每个大国的崛起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变化。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逐渐实现,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感知最明显与顾虑较多的当属周边国家。周边国家自然会考虑届时亚洲的秩序会是积极变化,还是消极变化;会增加他们的国家利益,还是会导致他们国家利益的减少。从中国的角度看,从古至今,周边地区一直是中国战略利益所在,尤其是中国的安全利益系于周边地区。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地理大发现以前,中国所谓的“天下”只是亚洲地区,而地理大发现以来,伴随着文艺复兴与工业化革命,中国又远远落后于西方,也无力走出亚洲。亚洲地区始终是中国思考国际秩序的基础。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加快,美国也在地

区秩序构建层面加大了对中国的妖魔化,并试图动员其他国家共同对抗中国,相关国家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式发布“美国的对华政策”,认为“中国是对国际秩序起到破坏作用的国家”,“中国是唯一既有意图又有能力重构当今国际秩序的国家”,强调要考虑“如何捍卫国际秩序的价值观与机制”^①。同时,“美国最关心的战略性问题是中国是否会最终取代美国的亚洲领导地位”^②。美国认为“中国的目标首先是获得亚太主导权,最终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③。

区域秩序构建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包括战略目标的明确、战略能力的保障、战略手段的跟进,自然不可能做到密室政治与出奇制胜。中国必须在规范性层面和操作性层面对未来的周边

收稿日期:2022-12-31

作者简介:王俊生,男,河南沈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

秩序做出设计,回答好“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具体内容及建设路径^④,否则就无法在周边站稳脚跟而顺利走进亚洲,也就谈不上构建国际秩序与走向世界。中国关于未来地区与国际秩序的观念并非凭空想像而来,而是深植于传统历史文化之中,“回顾中国历史,皇权的、共和的、当今的,都对其重新崛起的角色产生影响”^⑤。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⑥。

既有研究较少从历史脉络上进行严谨的系统分析。门洪华认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1985年邓小平开始提出和平与发展主题,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全面参与国际秩序提供了战略指向。自此,中国走上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进而塑造世界的崛起之路”^⑦。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的分析与此类似,他主要分析了194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国际秩序观,认为毛泽东时代对国际秩序充满敌意、邓小平时代对国际秩序积极参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求变与制衡^⑧。金灿荣对晚晴到十八大后的国际秩序进行了历史性考察,其不足之处在于对秩序的特点及秩序演变背后的逻辑论证不够^⑨。由此可见,学界有必要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秩序观进行系统研究,使得对中国秩序观的分析更具有历史逻辑。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历史脉络出发,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的地区秩序观及背后逻辑。本文的理论假设是:处于历史巨变中的中国在对外秩序观上虽然在不同时期有巨大区别,但考虑到文化的影响以及国家利益中恒定的因素,也存在一定的连续性。

二、封建帝制时代:朝贡体系

朝贡中的“朝”最初指的是诸侯觐见天子,“贡”指的是诸侯向天子贡献的物品,如《左传·宣公三年》所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⑩。朝贡体系自大约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公元19世纪末期随着封建帝制的没落而走向没落。对于朝贡体系,中国国内主要从历史领域进行研究,将其作为古代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方式^⑪。费正清则将朝贡体系视为中国的世界秩序观^⑫。

朝贡体系由来已久,但是真正作为制度确立下来是在明朝时期。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把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小琉球、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刺、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写入《祖训》,告诫子孙: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朝贡体系中“厚往薄来”的原则也由此开始确立。自此以后,朝贡体系作为中国主导与亚洲地区普遍接受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体制开始运行。当时统治精英所谓的天下主要指的是中华中原王朝,基本上是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的一部分^⑬。以今天的疆域进行划分,曾经向中国朝贡的国家有日本、蒙古、越南、朝鲜、韩国、文莱、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老挝、缅甸、不丹、尼泊尔等国以及部分中亚国家,涵盖中国周边地区。朝贡体系也逐渐发展成为周边国家之间处理彼此关系的一种方式。历史上,日本与琉球和朝鲜之间、朝鲜与女真之间,以及越南与占婆和南掌等国之间,都建立了朝贡体系。

在朝贡体系运行的同时,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兴起条约体系与殖民体系。条约体系确立的标志是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当时欧洲国家之间确立了主权原则,处理彼此间关系普遍采取签

订条约的方式。随着西方国家开始扩张,殖民体系又成为他们处理与其他弱小国家关系的主导体系。中国的朝贡体系开始与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产生碰撞。1653年,俄罗斯沙皇派遣使节访问清朝,以建立殖民体系为出发点,要求顺治皇帝向其俯首称臣,顺治皇帝勃然大怒。历经漫长的武力冲突和外交斗争,双方于1689年按照欧洲国际公法惯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开创了中国用条约体系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先河。同时,欧洲势力逐渐蚕食了中国周边的各小国,使得朝贡体系的范围大幅缩小。清朝中期承认朝贡体系的国家尚剩下7个,即朝鲜、越南、南掌、缅甸、苏禄、暹罗、琉球。

1793年,随着历史上著名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同年6月,使团刚从天津一上岸,便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地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英吉利贡使”,中国官员还把“礼物”改成“贡物”。这引起了乔治·马戛尔尼使团的不满。清朝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中国皇帝的惯例三跪九叩,马戛尔尼使团认为这是极大的屈辱,坚决抵制。乾隆帝闻讯,勃然大怒,下令降低接待规格。同年8月13日,使团最终得以觐见乾隆皇帝,但对当时究竟施行的是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不同,可见双方对此的巨大分歧。马戛尔尼提出按照条约体系发展中英关系,比如签订通商条约、派遣使节等,自然被清朝否定。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的不相容,预示着冲突不可避免。1842年中国战败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西方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不得不接受殖民体系。随后,中国又在与法国和日本的战争中陆续战败,越南与朝鲜这两个朝贡体系的最后成员也相继沦为法国与日本的殖民地,自此朝贡体系彻底崩塌。这一进程中,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本身逐渐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殖民体系成为

主导体系。其中,泰国、缅甸、尼泊尔、不丹、锡金、阿富汗、巴基斯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越南、老挝沦为法国的殖民地,阿富汗与其他几个中亚国家沦为俄罗斯的殖民地,朝鲜、琉球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朝贡体系虽然在实践上被终结,但是其影响是巨大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国当前实行的也是朝贡体系,《美国的“朝贡体系”》一文指出,“美国决策者们喜欢用‘辐辏’(hub-and-spokes)比喻来描绘美国及其东亚盟国之间的战略联系,这种说法更能说明问题。有趣的是,美国的大多数东亚军事盟友似乎都对这种表述感到满意”^④。这也表明作为一种曾经的秩序形态,其学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综合来看,朝贡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制度化。明朝时期已经将朝贡体系写入《祖训》,形成制度;清朝时期则进一步制度化,在政治制度层面设立礼部以处理与朝贡国的关系。在这套礼仪制度下,尤其在明清两代,朝贡国来华朝贡的贡期、贡道、规模、表文、贡物、朝廷的回赐、册封等皆有明确规定,朝贡事务管理机构完善而具体,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署,既有朝贡事务主管机构,也有负责某项具体事务的关涉机构,各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⑤。

二是政治文化上存在明显等级性。朝贡体系存在隶属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分。中原王朝处于等级中心,强调“中心—外围”差序,朝贡国给中原王朝的礼物称为“贡”,中原王朝给朝贡国的礼物则称“赐”。政治上,尽管中原王朝不拥有各藩属国的管辖权,但拥有裁判权。文化上,强调华夷之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字、儒家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朝贡国之间也存在等级性。其中和中国关系最近的藩属国是朝鲜与越南,一年一贡。明清在北京专门修建了朝鲜馆和越南馆,用来接待两国使团。琉球、寮国(老

挝)、缅甸、暹罗(泰国)等大致属于两年一贡的国家。爪哇、菲律宾、尼泊尔、中亚诸国等则属于第三梯队的藩属国。

三是朝贡体系逐渐成为一种贸易手段。在“厚往薄来”原则引导下,朝贡体系逐渐演变成一种贸易往来,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朝贡几乎成为这些国家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手段,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⑥。当时明朝规定,对使者除贡物外所携带的大量私人物品或者由朝廷收买,或者任由使者自行买卖,朝廷不收税。这项政策鼓励了很多使者携带大量私人物品来华做买进卖出的“倒爷”^⑦。

四是有对内巩固政权合法性的考虑。封建帝制时代皇帝统治中国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是儒家教义,而朝贡体系是由儒家教义发展而来的,因此,朝贡体系的运转就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一部分。同时,既然自称天子,就需要外邦的朝贡来体现中华天朝上国的气象^⑧,因此,古代中国皇帝尤其喜欢“八方来贡,万国来朝”的排场。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就迅速派出使者出使朝鲜、占城、安南等周边邻国,通知诸国明继元统,宣扬大明国威,巩固政权正统性并维护皇帝权威。永乐篡位夺政,因政权合法性基础脆弱,更是极度希望建立万邦来朝的盛象,派郑和远航与此也不无关系。

朝贡体系是一把双刃剑,既维持了亚洲和平,同时也使得中国故步自封、盲目自大,久而久之就觉得自己是天下独尊,这显然不利于形成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对此,徐波指出,“古代东亚朝贡体制具有相当强烈的内向性,是帝制政府彰显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工具,妨碍了古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从而使当时的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在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时却失去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⑨。王庚武也指出,“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史上,中国优越性在很多时期是一

种事实,但在另外一些时期则是明显的虚构,是一种自我陶醉、自高自大的迷思罢了”^⑩。

三、中华民国时期:条约体系

1912—1949年是中华民国时期,它又分为北洋军阀时期与国民政府时期。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从此进入现代国家的历史。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接任临时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并相继解散国民党与国会,北洋军阀政府正式建立。随后国民革命军开始北进讨伐北洋政府,随着北伐战争形势好转,1925年7月,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在广州正式组建国民政府。1928年12月,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北洋军阀统治结束,中国进入了国民政府全面统治时期。

按照阎学通的解释,对国际秩序的判断有三个层次:秩序的有无、秩序的稳定与否、秩序的公平正义性如何^⑪。由秩序的本质特点是“稳定”来看,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中国处于典型的不稳定状态,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将目光聚焦于争权夺利,不可能也无暇顾及建立周边和国际秩序。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甚至于1915年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同时,袁世凯政府为了取得俄国支持而与其签订协约,结果是俄国扶持外蒙古自治。当时的北洋军阀又分化为直、皖、奉三系。日本势力最大,是皖系和奉系的靠山,控制着中央政府;直系的靠山则是英美两国。由于中国局势混乱,尽管北洋军阀外交上曾经尝试维持中华传统秩序,但失败是必然的。比如,当时外交部试图利用俄国革命良机收复外蒙古的主权,在册封外蒙古活佛时试图彰显传统中华世界秩序的观念,但最后因皖系军阀介入而功败垂成^⑫。尽管如此,历史的车轮滚滚

向前,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为日后秩序构建奠定基础的积极现象。

一是思想观念的转化。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君权神授与皇权观念作为愚昧和落后的东西被人民彻底唾弃。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很快就遭到全国抵制,最终仓皇收场。这一时期还促进了“国家”概念的现代化。封建帝制时代只有朝代认同,没有国家认同,比如,清朝民众以“大清子民”自居,明朝民众则以“大明子民”自居,而辛亥革命后,民众意识里开始有了“中国人”的概念。

二是外交机制出现了一定的现代化。北洋军阀提出享有作为文明国家应享有的权利,即改变不平等条约,争取成为与欧美各国平等的国家,开始尝试利用条约体系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北洋军阀还开始尝试收回国家主权。1917年3月,北洋军阀随着宣布加入协约国,开始单方面强制收回作为同盟国的德国与奥匈帝国在中国的租界,这是近代历史上中国政府首次收回租界。同年8月,随着中国对同盟国宣战,中国停止向德国与奥匈帝国继续支付庚子赔款,开始尝试突破不平等条约的制约。

三是开始尝试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当时北洋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有利用国际法的考虑,因为只要参战就势必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有发言权,正因为如此,日本当时强力阻挠中国参战^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1920年,中国在国际联盟第一次大会上当选为行政院四席非常任会员国之一^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国际新旧秩序更替的重要时期,国际联盟可被视为联合国的前身,中国在国际联盟中的地位获得认可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尤其是远东大国的地位开始显露出来。中国还推动会议签署了“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完整”的《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

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这些都使得中国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后,上述趋势进一步发展。1928年6月,中华民国尝试“革命外交”,旨在调整不平等条约,但由于中国当时羸弱不堪,因而没有取得多大实际效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同盟国后,效果才开始逐渐显现。随着1941年12月中国宣布加入同盟国对德、意、日宣战,1942年中国与英国和美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英美放弃在华的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权、内河航行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陆续收复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固有领土,参与创建了联合国并成为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一时期,被英国、苏联、日本力图分裂的西藏、新疆、“满洲国”等相继回到中国版图内,只有外蒙古在苏联和国民政府的策划下最终脱离中国版图^④。

如果说封建帝制年代朝贡体系的主要特点是模糊的“天下观”,那么包括北洋军阀在内的中华民国时期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开始利用条约体系维护国家利益,包括通过艰难的谈判控制海关、关税、邮政、盐专卖岁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取消外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同时,与西方进一步就司法、商业、文化等进行谈判。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进步和在国际社会的逐步活跃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有直接关系。正因为如此,1945年6月26日中国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派出的董必武。

四、新中国成立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一)毛泽东时期:反对西方国际秩序

这一时期中国百废待兴,外交上的头等大事仍然是致力于恢复主权完整。毛泽东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一定要穿过东交民

巷,因为当时的东交民巷是外国列强的“国中国”,被西方各个国家占领着。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管会发布公告,北京市内所有帝国主义军营一律收回,建筑全部征用,外国的驻兵权必须取消,不平等条约不予承认,七日之内各使馆人员全部撤离。为此,美国驻华总领事柯乐博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称自《辛丑条约》签订以来,美国便享有在东交民巷的驻兵权,希望新中国不要采取所谓“侵犯美国权力”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对此予以严厉拒绝。在对苏关系上,主权问题也是不容讨论的议题。1959年,中国在研发核武器方面希望得到苏联帮助,对此苏联竟然要求享有在中国沿海地区自由使用无线电通讯的权利,以及中苏组建联合潜艇部队。对此,毛泽东明确说“不”,这也是中苏关系开始破裂的主要原因。

这一时期中国推动秩序构建中的和平主义开始显现。毛泽东明确指出,“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和平为上”^③的外交原则。对于实现和平的路径,毛泽东指出,只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也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彻底消灭战争,“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才可能到来。^④1953年在与印度谈判时,周恩来代表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并指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的^⑤。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当天,中国就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更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是当前五个核国家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国际秩序是严重对立的。中国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下的所有组织之外——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关税贸易总协定以及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中国积极支持许多东南亚国家的革命运动,参加朝鲜战争抵抗韩国和美国,并在远离中国本土的世界各地特别是在非洲地区为革命运动提供资助。中国的目的在于以社会主义秩序取代资本主义秩序。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既有重构国际格局的设想,也有改变国际秩序的含义。

(二)邓小平时期:与西方国际秩序接轨

在邓小平时期,尽管因台湾问题等还未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但中国已经实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目标,“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在周边地区已没有一个公开的敌对国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⑥。在此基础上,中国明确提出了对国际秩序改革的声音。

一是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多次指出,“为了维护和平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不管霸权主义来自哪一方面,我们都反对”^⑦。“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⑧。

二是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⑨。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原则,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⑩。在此基础上,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将建立新秩序定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对新秩序的内涵作了系统阐述:“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

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⑤这一政策一直被坚持下来。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都专门用一段来阐述建立新秩序问题。

三是与国际秩序接轨。这一时期,中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融入国际体系。中国不仅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而且于2001年按照邓小平生前确定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路线正式加入该组织。1974年,联合国大会决定于当年4月召开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团赴纽约出席会议并发言,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邓小平成为首位登上联合国讲坛的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中国还与美西方改善了关系。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中国与美国就台湾问题上的应废约、撤军、断交的建交原则达成共识,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目标是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邓小平在讲到对外工作时,常说的话就是“对中国是否有利”,也即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与分析问题。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反复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⑦。不同于毛泽东时期总是提醒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一时期世界趋势已经转向和平与发展,这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

(三)习近平时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时期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强化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定位的自我认可,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实力基础与理论引领。在此基础上,中国明确提出了国际秩序变革的具体方向,

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2年12月,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时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2013年3月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的国事访问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就提到了“命运共同体”,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三次强调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可以说,“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几乎贯穿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出席的每一场重大外交活动中。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与世纪新冠病毒疫情交织叠加,同时地区冲突不断。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⑧,科学回答了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中国正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推行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

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揭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同属一个世界,当前全球贸易的80%由全球价值链贡献,国家间的紧密联系和彼此依赖达到唇亡齿寒的程度。针对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且逆全球化仍在发酵,某些国家奉行冷战思维与拉帮结派,严重毒害地区和平稳定,习近平在2021年9月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和2022年

4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分别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为世界走出困局与早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愿意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⑨。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要另起炉灶,而是以现有国际体系为基础。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⑩,这说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建立在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⑪。

五、中国地区秩序观的扬弃

综上所述,从朝贡体系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明中国秩序观逐步回归,作为中国人的地区秩序观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一是地缘战略重心的重叠性。尽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但中国地缘战略重心仍在周边地区。“中国人眼中的战略利益基本集中于朝贡体系所覆盖的地区及其他邻国”^⑫,这典型体现在2013年中国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精神中。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⑬。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推出了四个多边平台,即“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亚洲文明对话,后三个平台主要聚焦于亚洲地区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主要在亚洲地区。中国越是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会重视周边外交,中国与周边呈现出“重视周边——走向世界——再重视周边”的关系。

二是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盾。据统计,朝贡体系下的东亚,从明朝1368年建立开始,到1841年朝贡制度开始解体,近五百年间只发生过两场战争,即1407年中国出兵讨伐越南与1592年中国因日本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出兵保护^⑭。但是,同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后的几百年,欧洲的大小战争就没停过,仅仅英法之间在1300—1850年间至少发生了46次战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延续了历史上的和平发展道路。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中国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和其他国家发生过战争,这在大国对外关系史上极为罕见。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的国家。在习近平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中,第一个就是“和平”。世界主要大国中没有像中国这样再三正式宣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多次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⑮

三是不干涉内政原则。在朝贡体系下,中国对朝贡国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文化的感召力与政治关系隶属上,朝贡国的内部事务不属于中国管辖范围。朝贡国在军事安全上需要中国支持时,中国军队在对方国家停留的时间从来都是以对方国家恢复秩序的时间为限。在朝贡体系下,当朝鲜受到日本侵略请求中国派兵帮助时,中国帮助朝鲜赶走了日本军队,等秩序恢复后中国就撤回了军队。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际环境与中国实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介入邻国战争的方式仍然没有改变。比如,在

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尽管帮助朝鲜战胜了美韩,但是战争胜利后不久中国军队很快从朝鲜彻底撤出。相反,美国在韩国的军队则一直保留到今天,并发展为排他性、有固定对手的军事同盟。中国在援越抗法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都是如此。毛泽东反复讲“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⑥，“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⑦。习近平也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⑧。

四是推动秩序构建的基础在于实力。尽管在秩序的内涵上,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实力,有的认为不包括实力^⑨,但从中国推动秩序构建的历史演变来看,实力是秩序构建的基础。朝贡体系虽然侧重于政治象征与文化感召,但是中国实力的强大是当时朝贡体系运转的基础。当中国处于分裂与国力羸弱时,朝贡体系就会崩溃。在汉武帝击败匈奴、开通西域后,由于不再存在现实对手,中原王朝的朝贡体系才开始确立。随着中国自身开始衰弱,朝贡体系逐渐被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所取代,中国自身也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改善的开端从根本上讲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密不可分,尤其是与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中国在秩序中的地位是用牺牲换来的。同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最终也要以实力为后盾,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与此同时,中国秩序观的回归并非简单重复。其一,实现了从亚洲中心到世界中心的转变。朝贡体系的范围主要是在亚洲,中国封建帝制全盛时期的影响力也仅限于亚洲,而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地理范围来看从亚洲走向了世界。其二,不同于封建帝制时代,中国推进秩序构建与处理国际关系主要是朝贡体系,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开始用主权原则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点在辛亥革命后尤为明显,随后,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主要是主权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全面融入西方国际体系,而且是最坚定的主权原则坚持者。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再次回到明清时代的朝贡体系,中国外交的进步,尤其是用主权原则推进国际秩序与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将继续得到延续。其三,中国看待周边与世界秩序的视角与心态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的俯瞰天下发展到平等看待世界,从以前的封闭自大发展到包容开放。在朝贡体系中,中国是“没有邻国的帝国”。但进入条约体系后,中国成为“万国”之一,世界格局也从“天下一统”转变为列国林立^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显然不是仅仅靠中国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谈及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指出,“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⑪。中国越是发展强大就越应该保持平等、谦虚、开放、包容的姿态,从而赢得更多国家与中国携手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 ① 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 ② Robert Sutter, “Assessing China’s Rise and US Leadership in Asia: Growing Maturity and Bal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9, No. 65, 2010, p. 604.
- ③ 王帆:《美国对华战略:战略临界点与限制性竞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第140页。
- ④ 达巍:《现行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与中国的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0页。
- ⑤ 陆克文:“澳大利亚中国与世界——在第70次莫理循讲座上的讲话”,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官网,2010年4月23日, <https://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prmspch2010.html>.

- ⑥“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共产党员网,2022年7月15日,<https://www.12371.cn/2022/07/15/ARTI1657869689082395.shtml>.
- ⑦门洪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第4页。
- ⑧JEFFREY A. BADER, How Xi Jinping Sees the World... and Why,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xi_jinping_worldview_bader-1.pdf.
- ⑨金灿荣,刘冰若:《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变与发展》,《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 ⑩《左传·宣公三年》。
- ⑪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付百臣:《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喻常森:《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 ⑫J. K. Fairbank and S. Y. Tê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1, Vol. 6, No. 2, pp. 137;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39页。
- ⑬⑭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42、59页。
- ⑮邝云峰、刘若楠:《美国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第76页。
- ⑯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14年5月版,第89、142页。
- ⑰李国强:《“一带一路”倡议绝非恢复历史上的朝贡关系》,《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第35页。
- ⑱J. K. Fairbank and S. Y. Tê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1, Vol. 6, No. 2, pp. 137, pp. 140—141.
- ⑲许波:《对古代东亚朝贡体制的再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3期,第85页。
- ⑳Wang Gungwu,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 Background Essay,” in John King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36.
- ㉑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1页。
- ㉒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2页。
- ㉓㉔颜丽媛:《拒签合约之后:和平解决山东悬案的国际法预案》,《国际法研究》,2020年第5期,第51—52、51—53页。
- ㉕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 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 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 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 ㉙《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五项原则的表述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2页。
- ㉚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 ㉛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9页。
- ㉜㉝㉞㉟《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282、96、57、156页。
- ㊱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参见共产党员网,<https://fwu.12371.cn/2012/09/26/ARTI1348641194361954.shtml>。
- ㊲㊳㊴㊵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2、63、62、62页。
- ㊶“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全文)”,共产党员网,2015年9月29日,<https://news.12371.cn/2015/09/29/ARTI1443480286202978.shtml>。
- ㊷JEFFREY A. BADER, How Xi Jinping Sees the World... and Why,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xi_jinping_worldview_bader-1.pdf, P12.
- ㊸“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共产党员网,2013年10月26日,<https://news.12371.cn/2013/10/26/ARTI1382734280462617.shtml>。
- ㊹当时中国和游牧民族之间爆发的战争不属于国与国,这些游牧民族不是国家。
- ㊺“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共产党员网,2014年7月4日,<https://news.12371.cn/2014/07/04/ARTI140>

4477392399706.shtml.

- ④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
- ④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 ④⑧“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共产党员网,2021年10月9日,<https://www.12371.cn/2021/10/09/ARTI1633784656910440.shtml>.

④⑨比如,阎学通与贺凯在这方面的区别,可参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贺凯,冯惠云:《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一种类型化分析》,《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

⑤⑩吕存凯:《近代中国世界秩序观的转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128页。

[责任编辑 杨年保]

From the Tributary System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Regional Order

WANG Junshe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ic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China's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order has experienced changes from the tributary system, the colonial system and the treaty system.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n regional order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history. China's strength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regional order rebuilding has undergone U-shaped changes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and then to prosperity again. However, China's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order have not simply repeated, but realize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herited aspects include: geostrategic focus lies in China's surrounding areas,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fferences, non-interference in other countries' internal affairs, and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ngth and system. The changes lie in that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moved from Asia to the world geographically, from overlooking the world to treating the world equally, from being closed and arrogant to being inclusive and open. At present, China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le continuing to develop its strength, China should especially win the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continue to maintain an attitude of equality, modesty,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Key words: Chinese regional order viewpoint; regional order; hundred-year reconstructi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reat each other as equals